

第一章 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」

——孟子和他的時代

公都子曰：「外人皆稱夫子好辯，敢問何也？」

孟子曰：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！……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，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歸楊，則歸墨。……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詖行，放淫辭，以承三聖者；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……」

《孟子·滕文公下·9》

一、孟子的生命情調

孟子（公元前372?-289?年）是繼孔子（公元前551-479年）之後，中國古代偉大的儒家。他是戰國時代鄒國（今山東省鄒縣）的人^①，他並未受業於子思，而以孔子私淑弟子自居，一生從事教育事業，開帳授徒。孟子生於中國古代封建制度已崩而未潰，各國戰爭頻仍以爭奪中國的主導權的戰國時代（公元前403-222年），他奔走各國，遊說諸侯，批楊墨，駁農家，斥告子，在亂世中展現他特殊的風格與人格。在本章開始時所引用的《孟子·滕文公下·9》裏，孟子弟子公都子就轉述外界批評孟子好辯的話，孟子的回答是：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」公都子是孟子弟子中，才德及輩份均較高的，在《孟子》全書記載弟子言行中，只有公都子、樂正子、屋廬子三人被稱為「子」^②，以示尊

① 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云：「孟軻，鄒人也。」

② 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：「孟軻，鄒人也，受業子思之門人。」《索隱》云：「王劭以『人』為衍字，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。今言『門人』者，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。」趙岐《孟子題辭》云：「長師孔子之孫子思，治儒者之道，通五經，尤長於詩書。」司馬遷與趙岐的說法均無法成立。從孟子與子思的生卒年代考之，孟子生年去子思三十餘年，實無可能受業於子思。崔述（東壁）考證最精，他說：「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齊，燕人畔時，一百六十有六年矣。伯魚之卒在顏淵前，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。而孟子去齊後，居鄒，之宋，之薛，之際，為文公定井田復游於魯而後歸老，則孟子在齊時亦不過六十歲耳。即令子思享年八十，距孟子之生，尚三十餘年，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！孟子云：『予未得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』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，則當明言其人，以見其傳之有所自，何得但云『人』而已乎！由是言之，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，史記之言是也。然孟子之學深遠，恐不僅得之於一人，殆如孔子之無常師者然，故但云『私淑諸人』耳。」（《孟子事實錄》卷上，收入：《崔東壁遺書》，顧頡剛編訂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，頁411）這種說法可以成立。

稱，其餘弟子或稱名（如充虞、公孫丑、萬章等人），或稱「子」或稱名，如陳臻（亦稱陳子）。孟子的回答中，「不得已」這三個字，很能夠刻劃孟子的人格特質和他對他的時代的感受。

在我們說明孟子對時代的「不得已」的感受之前，我們先看孟子這個人。孟子的人格特質，有三個特別突出的面向：

（一）強韌的生命力：

我們只要通讀《孟子》這部書所記載關於孟子的言行，就會被孟子那種強韌的生命力所震懾。在戰國時代那一段迅雷風烈的變局年代裏，不論是統治者、知識份子或一般人民，多半不能免於在歷史的漩渦裏載浮載沉，隨波逐流。統治者汲汲於開疆拓土，橫徵暴斂；知識份子則多半奔走於國君與權貴之門，諂媚奉承，下焉者求衣謀食，上焉者則冀求分食權力的大餅；而一般芸芸衆生，則成爲歷史狂流中的浮萍，他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，只能如棲息於豪宅巨院樑上的燕子，隨人換姓，便成歸宿。

但是，孟子是戰國亂世中一個不屈的靈魂，他的一生所展現在世人們眼前的是一種極爲強韌的生命力。這種強韌的生命力主要表現在孟子的不隨俗俯仰，有所爲有所不爲，他時時以雄渾有力的方式批判時代的墮落。通貫孟子的一生，他戰鬥的對象就是當時社會最深沉的病——功利主義。

瀰漫於戰國時代的功利主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：

第一是各國統治者目光如豆，追求一時、一國的利益，從未考慮人民整體的福祉。戰國時代各國的國君都像孟子所斥責的梁惠王（在位於公元前370-319年）一樣地，「以土地之故，靡爛其民而戰之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·6》）。再加上當時一般的知識份子

如蘇秦、張儀之流，鼓其三寸不爛之舌，挑撥諸侯，謀求衣食，「一怒而諸侯懼，安居而天下息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·2》）。

第二則是一般人民在這種歷史扉頁快速翻動、經濟急驟轉型的時代裏，也隨波逐流，追逐物慾。最具體反映逐利風氣的，就是一般人民的貨財觀念的變化：春秋時代的人多以具體貨物的數量來指稱財富的多寡，他們的財富概念比較素樸；但到了戰國時代，以抽象的計量單位如「鎰」、「斤」來數說財富的多寡，已經日趨普遍。舉例言之，《論語》所說：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，至於他邦。」（〈公冶長〉），以十乘之馬稱陳文子之富，但在《孟子》書中則金「七十鎰」、「五十鎰」（〈公孫丑下·3〉）已屢見不鮮^③。這種貨財觀念的轉變，固然是貨幣廣泛應用的經濟背景的反映，實際上它也與謀利風氣日盛的社會變動相表裏。孟子見梁惠王，王以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」相問，這絕不是偶發事件，它反映了日益壯大的唯利是求的歷史趨勢。

孟子的一生就是一直在與以上這種功利主義的心態與行為作戰，他明白舉世滔滔，皆為利來，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，但是他絕不向現實低頭。就當時的時代風潮而言，孟子可以說是一個「逆流游泳」的人。他的一生就在這種反潮流之中，展現他全幅的強韌的生命力。

（二）強烈的使命感：

孟子的人格特質的第二個突出面就是他所抱持的強烈的使命感。孟子畢生以強韌的生命力抗拒並批導時代的潮流，他之所以

^③ 關於春秋戰國時代貨財觀念的討論，參看：李劍農：《先秦兩漢經濟史稿》，頁65。

具有這樣強韌的生命力，主要的精神資源之一，就是來自於他的強烈的使命感。最足以顯示孟子的使命感的，是他離開齊國時與充虞的一段對話：

△ 孟子去齊，充虞路問曰：「夫子若有不豫色然。前日虞聞諸夫子，曰：『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』」曰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，以其數則過矣，以其時考之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！吾何為不豫哉！」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下·13》）

孟子離開齊國是在公元前 312 年（周赧王 3 年己酉）。齊國是戰國中期以後國際政治的中心，孟子對齊國的國君如齊宣王（在位於公元前 319-301 年）頗有期望。在《孟子》書中，孟子與齊宣王問答而有明文記載的就有十四章^④。齊宣王對孟子也頗為禮遇，為孟子和他的弟子建造居室，養以萬鍾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下·10》），但這都不是孟子之所期望於齊宣王的。公元前 314 年，燕國發生動亂，齊國趁勢攻燕，孟子雖不反對伐燕，但卻更主張齊宣王應以燕國的民意為依歸，齊宣王不能採納孟子的建議，終於引起燕人的反叛。孟子失望之餘，乃離開齊國。他回答充虞的話中說：「上天如果想平治天下，那麼當今之世除了我之外還有誰呢？」這一段話充分告訴我們，孟子那種浩氣盈胸的使命感。△ 孟子之所以遍遊梁、齊、宋、滕、魯……等國，勸說各國統治者施行仁政，就是由於這種使命感的驅迫，使他希望經由他的努

④ 崔述：《孟子事實錄》，卷上，頁420。

力，而拯生民於水火之中。

(三)剛直的氣概：

孟子人格特質的第三個突出面向，是他與人相與之際所表現的剛直的氣概。在社會階層急速重組的戰國時代，許多人爲求富貴而奔走權門，昏夜向有權者搖尾乞憐，白天則以富貴驕人。孟子最看不起這種妾婦之道，《孟子·離婁下》第 33 章，所嘲諷的那個有一妻一妾的齊人，就是這種人的代表。

孟子這種剛直而絕不敷衍的氣概，尤其表現在他與有權者的往來言談之間，最著名的是他和梁襄王之間的一段故事：

孟子見梁襄王，出語人曰：「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：『天下惡乎定？』吾對曰：『定於一。』『孰能一之？』對曰：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』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·6》）

這一段故事很傳神地刻劃出孟子的剛直個性，他對他看不起的國君如梁襄王，直斥之爲「望之不似人君」。在他決定離開齊國的時候，有人代表齊王來挽留孟子。孟子爲了表示他的憤怒與抗議，在來人恭敬地坐着慰留他的時候，他不假辭色也不回應，身子倚着小几，作半臥狀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下·II》）。孟子不僅與人相往來之際，表現他的剛直不妥協的個性，他對他所不能接受的學說更是撻伐不遺餘力，他批判楊朱與墨子說：「楊氏爲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。無君無父，是禽獸也。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·9》）這樣激烈的言辭，很能烘托孟子剛直不阿

的個性。

我們在上文中所描寫的孟子的生命力和使命感，以及他的剛直的個性，都刻劃出孟子這一個活潑而有生氣的儒家風範。但是，孟子的人格與風格，在戰國時代的世態中，卻如逆流游泳，格格不入。那麼，孟子所生的是一個怎麼樣的時代呢？且讓我們揭開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舞臺。

二、戰國時代的世局

春秋戰國時代（公元前 722-222 年）五百年間是中國歷史上社會、經濟、政治秩序變動最激烈的時代之一。當代學者對春秋戰國的變遷已有深入的研究，我們在此僅須就前人研究成果略作綜合，即可看出整個變局大勢之所趨。春秋戰國時代的變局在政治史上表現極為顯着。東遷以後，王綱不振，王命不行，已日漸明顯。天子所能控制的，僅是王畿附近小範圍的地區，對諸侯國內篡弑廢立之事，則天子已無力行征討之實。我們僅就錫命史實來看，春秋時代諸國在二百數十年間，只有九次錫命之記載，即以與周室關係最密切之魯國而言，在春秋時代魯國十二個公之中，受錫命者亦僅有桓、成、文三君而已⁵。王命之不行，由此可見一斑。即使在上述的九次錫命之禮中，亦非諸侯親至王所受命，而是周天子遣使赴諸侯之處宣命，由此可見王室之權實已喪失，僅徒具虛名而已。在各諸侯國內部，國君與同姓貴族爭權成爲普遍現象，如：魯君與三桓爭權失敗，政權歸於三桓之手，或

⁵ 見：齊思和：〈周代錫命禮考〉，《燕京學報》，第 32 期，頁 224。

國君與異姓諸侯爭權（如晉、齊兩國），田氏篡齊都是其著名例子^⑥。這些諸侯國內部的政治變化，有助於平民中才幹之士的崛起，參與國政。小人竄升的結果，則又引起了原有封建秩序下階級的混亂。復由於郡縣制度逐漸建立，遂瓦解了封建制度的政治基礎。在這個政治背景之下，諸侯互爭中國之領導權，爲了實際需要，而大力實行尚賢政治，由此更加速了社會的變動^⑦。

從春秋到戰國，社會變動的激烈以及社會流動的大增，是最引人注目的現象。歷史學家曾從班固《前漢書》的〈古今人表〉裏所記載的一九九八個人名中，選出見之於《左傳》的五一六個作爲「任意選樣」(random sampling)，以統計方法作量化分析，指出公子集團在春秋早期原在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，或襄理國政，或帶領軍隊，或對外代表國家，甚或覬覦君位。但隨着時間的流逝，其重要性亦遞減，春秋中期，當公子集團下降之時，卿大夫集團亦逐漸上升，政治中心由公子集團移至卿大夫集團。如果再把春秋二百五十八年（公元前 722-464 年）分成九期，每期三十年，在五百十六個任意選樣當中，卿大夫集團占三百三十五人，即百分之六十五，其中尤以第四及第五期（公元前 632-573 年）達於最高潮。在這三百三十五人中，在政治上活躍者占二百十八人，值得注意的是卿大夫集團中多集中於少數大家族。到了春秋末期，士集團逐漸抬頭。從卿大夫集團之逐漸失其重要性，與士集團之漸露曙光上，我們可以看出，春秋末期一部

⑥ 參考：李宗侗：《中國古代社會史》（二）（臺北：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，1963），頁233~243。

⑦ 另詳黃俊傑：《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》（臺北：問學出版社1978），第二章，〈從親親到尚賢：封建制度的建立及其瓦解〉，頁 27~42。

份的政治中心逐漸由卿大夫轉入士人手中。春秋時代寒微出身的人物占百分之二十六，到了戰國時代則激增至百分之五十五。這個現象是伴隨着春秋晚期卿大夫集團的沒落而來的，這不僅說明了戰國初期開始有活潑的社會流動現象，亦指出了過去占優勢的卿大夫集團之完全失勢。總而言之，戰國之際，不僅社會流動增大，而且，過去的社會階層亦逐漸泯滅^⑧。

△經濟方面，主要的變動出現在農業技術的進步、工商業的發展、大城市的興起以及人口的增加等方面。農業技術的改良，主要表現在牛耕與鐵器在春秋戰國之際加入了生產行列，水利灌溉工程之運用，以及施肥技術之使用等等^⑨。工商業之發展則是由於各地區因產業的逐漸專門化，需要互通有無，而春秋戰國之際交通條件改善、各國統一地區擴大等因素，都為工商業的發達提供了先決條件。隨着工商業發達而來的現象，則是人口增加，大城林立，這些現象都增強了各國的獨立性，再加上土地私有制的形成，更加速瓦解了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。

除了以上所說的政治、社會、經濟方面的重大變遷之外，春秋戰國時代五百年之間戰爭的頻繁，也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。在西周時代（公元前 1027?-722 年），周天子有一定的權威，所謂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，雖然

⑧ Cho-yün Hsü, *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: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, 722~222 B. C.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5), Chap. 2.

⑨ 參考：許倬雲：〈兩周農作技術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四十二本，第四分，頁810~818。近人根據對近年來出土鐵器之研究，將中國始用鐵器之時代訂在春秋時代。並參考：Hsü, *op. cit.*, Chapter 4.

未必是歷史事實的正確描寫，但是，至少可以告訴我們，西周時代周天子的權威之高。但是到了平王東遷以後，天子權威日薄西山，諸侯之間的攻伐征戰日益頻繁。歷史學家曾統計春秋時代見之於記載的戰爭次數有一千二百餘次^⑩，歷史扉頁翻動處，盡聞殺伐逐北之聲，梁啓超譏《左傳》一書爲「相斫書」，亦頗能得其實情。到了戰國時代，世變日亟，見於記載的戰爭次數據統計雖僅有四百六十餘次^⑪，但不論就戰爭之規模、時間之持久，以及殺人之慘烈而言，均較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。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」（《孟子·離婁上·14》），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」（《道德經》），這些都是當時人所目擊的現象。根據現代歷史學的統計，戰國時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，見於記載的戰爭次數共 468.5 次（以戰國七雄之間的戰爭算 1 次，其餘小國間的戰爭算 0.5 次計算），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愈接近秦始皇統一中國之時，不見干戈的和平年代愈少^⑫。

戰國

戰國時代各國之間的互相攻伐，人民成爲統治者的俎上肉，當時的思想家對戰爭的殘酷與人民的痛苦，都寄予無限的同情，也對戰爭撻伐不遺餘力。例如年代稍早於孟子的墨子^⑬，對當時諸國之間的攻戰感受極爲深刻。戰國諸子對於當時日益頻仍的戰爭雖然均持反對態度，但只有墨子從功利的角度對戰爭問題給予一番批判。他說：

^⑩ Cho-yün Hsü, *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*, Ch. 2, Table 1, p. 56.

^⑪ Hsü, *op. cit.*, p. 64, Table 6.

^⑫ 同上註。

^⑬ 墨子，姓墨，名翟。魯國人。大約生於孔子卒後十餘年（公元前468？-459？年），卒於孟子生前十餘年（公元前390？-382？年），關於墨子

今大國之攻小國也。攻者，農夫不得耕，婦人不得織，以守為事；攻人者，亦農夫不得耕，婦人不得織，以攻為事。故大國之攻小國也，譬猶童子之為馬也。（〈耕柱〉篇）

其實，不僅墨子，幾乎戰國時代的人對於當時各國之間的互相攻伐，與戰爭之殘酷，都感同身受。

以上我們根據若干史料以及當代學者的研究論著，建構戰國時代的歷史圖像。現在，我們感到好奇的是：孟子對他自己的時代有何感受呢？

三、孟子對時代的認知

從《孟子》這部書所記載的孟子的言談中，我們可以歸納孟子對他自己所處的時代的認知。約而言之，大約有以下幾個突出的時代圖像：

生卒年代，是一個爭持未決的問題，各家說法互有出入：①生於周元王六年（公元前470年），卒於周安王十二年（公元前390年）見：梅賾寶：前引文，頁419。②生於周定王八年，卒於周安王二十三年。見：兒島獻吉郎著，陳清泉譯：《諸子百家考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），頁191～192。③生於周元王之世，卒於周安王十年左右。見：錢穆：《先秦諸子繫年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學，1965），上冊，頁89。④生於周敬王二十至三十年（公元前500-490年），卒於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（公元前425-416年）。見：胡適：《中國古代哲學史》（二）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65），頁4。⑤生於周定王元年至十年（公元前468-459年），卒於周安王十二至二十年（公元前390-382年）。見：梁啓超：〈墨子年代考〉，收入《古史辨》（香港：太平書局，1963），第四冊，上編，頁249。

第一是急功近利風氣的瀰漫。《孟子》書開宗明義就明辨義利，在孟子看來，他的時代最大的問題就是時人（尤其是各國國君）眼光短淺，只求近利與私利。我們看《孟子·梁惠王上·I》第一章中，孟子與梁惠王有這樣的一段對話：

√ 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「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王曰何以利吾國，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，士曰何以利吾身，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為不多矣。苟為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」

正如我在本章第一節所說的，孟子畢生以其強韌的生命力，對當時瀰漫於社會的功利主義心態，展開殊死的戰鬥。孟子明義利之辨的努力，在當時的歷史背景裏，雖然有一種揮魯陽之戈以返落日的悲劇涵義，但是，他的奮鬥卻為中國知識份子樹立了人格的典範與立身處世的楷模。

孟子所認知的他的時代的第二個突出問題，大概是政治的黑暗與墮落。他說：

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；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……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上·I》）

孟子認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，各國國君皆不行仁政，都「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，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·5》）。在孟子看來，當時的統治者沒有一個不好戰，他說：「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·6》）。孟子直斥梁惠王說：「不仁哉！梁惠王也。以土地之故，靡爛其民而戰之，……」，也斥責梁襄王以「望之不似人君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·6》）。

而對他的時代政治的黑暗，孟子提出一套理想中的政治圖像，他認為一個理想中的統治者，應該處處為人民的福祉設想：

……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。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？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鷄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·7》）

孟子認為他以上所描繪的這種「王道」政治的實施，是當時刻不容緩的急務。從孟子的言談中，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深刻的「時間的壓力感」。

孟子所感受到的時代的第三個問題，是戰爭的殘酷與人民的痛苦。戰國的國君皆好戰之徒，舉例言之，公元前320年當孟子

從鄒國來到魏（梁）國的時候，梁惠王急切地問孟子：「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，梁惠王所念茲在茲的就是「富國強兵」¹⁴。梁惠王對於公元前 341 年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」，以及公元前 330 年「西喪地於秦七百里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·5》）的往事，耿耿於懷。其實，在孟子的時代，不僅梁惠王，其他國君也汲汲於從事戰爭的冒險。二十世紀的史學家對春秋與戰國國君有以下這一段生動的描寫¹⁵：

若把戰爭比於賭博，那麼，春秋的列強，除吳國外，全是涵養功深的賭徒，無論怎樣大輸，決不致賣田典宅；戰國時代的列強却多半是濫賭的莽漢，每把全部家業作孤注一擲，每在旦夕之間，以富翁入局，以窮漢出場，雖然其間也有一個賭棍，以賭起家，終於把賭伴的財產騙贏淨盡。

戰國時代的國君的確每一個都是「濫賭的莽漢」。就以孟子所親證親聞的事實來看，「齊人伐燕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·10》），「鄒與魯鬪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·12》），「秦楚構兵」（《孟子·告子下·4》），都是孟子和他的學生所親身經歷的事件。

綜合以上所歸納的內容，孟子對他所處的時代感受最深的不外三種現象：（1）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；（2）王道政治的失落；

¹⁴ 趙岐、朱子及焦循皆以「富國強兵」解釋梁惠王問中的「利」字，這是很正確的解釋。關於進一步討論，參考：黃俊傑：《孟子思想史論》（卷一）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1），〈集釋篇〉，第三篇〈孟子義利之辨章集釋新詮〉。

¹⁵ 張蔭麟：《中國史綱》，〈上古篇〉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51,1963）頁 102。

(3) 攻伐征戰的頻繁。孟子所建構的他的時代圖像，與二十世紀現代史學工作者所建構的戰國時代的歷史圖像，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。功利心態的流行，當然是與春秋時代以來社會經濟的日趨繁盛互有關連；而各國政客的短視與戰爭的頻仍，也與周天子權威的崩潰以及封建體制的逐步瓦解，有深刻的關係。生於這樣一個時代的孟子，他時時受到感憤之心的催迫，使他「不得已」起而批判他的時代，並在激烈的批判中導引時代走向他理想中的正途。